

承 诺

冯 渊



临水照影 陈春丽 摄

母亲说，我十八九岁，媒人来说亲，说你爸在供销社工作，能把我也变成公家人，我才到你家来的。哪知道来了也还是成天下田，干不完的活儿。别人还有男人帮衬，你爸在外面，根本顾不上家。

母亲说，后来有了你，大脸盘，大眼睛，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，我在田里干完一天活儿，回来喊你，永伢呀，你跑过来，嘴角才往上拉一点。

母亲说，你五岁时，我跟你家里人怄气，把你抱在怀里，跟你说，永伢长大了，要和妈妈站在一起，保护妈妈。你瞪大眼睛，看到我哭，你也跟着流眼泪，使劲点头。

这个场景母亲不止说过一次。我听了，笑笑而已。母亲病逝十余年，她不断叙说的这个场景，时常出现在眼前。母亲是在回忆往事，还是在间接提醒我什么？

三十年前，我从皖西南乡下调到千里之外的皖西北城里，两地不通火车，长途汽车得辗转一天。那时儿子不到一岁，母亲刚进五十，跟我来到异乡帮着带孙子。父亲则留在老家照顾八十五岁的祖母。

单位给我分了两间房，加起来不到二十平米，朝北。这原本是一套完整的房子：中间一条走道，南北各两个小房间，南边有个院子，栽种了花木。院门朝北开，门外一间厨房。房子可能是三四十年前盖的，当初住在这里的人家调离了单位，却没有退还房子，他们的儿子还留住在这里。那是个三十多岁的无业男子，一脸呆滞，走路摇晃，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自言自语，大声叱骂。南院的花木早已凋敝，各种颜色不明的杂物随意丢弃，一派狼藉。

按理他是不能住在这里的，单位一直想让他搬出去，但没有人愿意出头来撵他走。我调过来没有房子，后勤派了泥瓦匠来，将朝北两间房通往南边的门封起来，朝北的窗户打通成门，院落和两间朝南的小房间归那个男人，朝北的两间房，还有那间摇摇欲坠的厨房，就分给了我。

两间房子，外间摆了张书桌，再放一张钢丝床，就抵到大门了。母亲说，我睡厨房吧。

我在厨房支了一张板床，靠床的墙面糊上报纸，隔绝那些陈年的灰尘和蜘蛛。厨房水泥地面破损，放一个煤球炉，最简单的厨具。母亲说，就这样，挺好。

正房墙砖朽了，泥瓦匠糊上一层水泥，水泥上再浅浅刷一道石灰。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，石灰都没干透，房子太潮了，地面常常沁水。门是从北墙上打开的，上面没有檐，北风雨轻易就扫进来。门前一块空地，大概百来平米，地上是随意丢弃的碎砖头，建筑垃圾，尽

头是公厕。公厕外面，靠房子这边，还有个晒大粪的粪池。一个年年岁很高的老头，每隔几天就拉一车大粪过来，在这片空地上晾晒。

我那时才二十多岁，根本无力处置身边这些盘根错节、稀奇古怪的事。

母亲将门口的砖一一铺平，门前居然有了四五十平米的干净空地。母亲将砖头一块一块朝北扔，又整出了两块菜地。撒上菜种，很快有绿油油的白菜长出来。在那些人迹难至的、靠北的砖头缝里，母亲还点了冬瓜种子。那年冬天，我们收获了十几只冬瓜，每只都有十几斤重，堆在厨房里，成了小家最丰盛的一景。

“这块地很肥。不用任何肥料都能长出菜来。”母亲说。她对这块菜地很满意。

老家的院子、房子，都比我住在这地方好多了。我让母亲遭罪了。母亲说，初来乍到，哪有事顺利的，我还能帮帮你。

我收入不高，每次母亲回老家，只给她盘缠钱。母亲说，回家要给她的老姊妹带点布料，总算是我跟着儿子进城了。我心里暗暗觉得她多事，住在这样的地方，有什么好显摆的。

“不是显摆，一点人情而已，人不能太自私。”母亲读过几年书，能阅读长篇小说，不同于她那一辈的乡下人。她很少跟我理论，真要说什么，话也不轻不重。我听出她话里的意思，没有自我检讨，还怪她不体恤儿子。似乎母亲做的一切都是欠我的。我已成年，继续剥夺她，完全无知无觉，我何尝有一点体恤她？

就这样过了四五年，弟弟的儿子出生了，母亲接力赛一样，又要赶去给弟弟带孩子。大孙子她是万分不舍，小孙子那边也不能不去。多年后，大孙子都上了高中，母亲还说对不住他，说起她离开的那天晚上，抱着大孙子一宿没睡。

等到弟弟的儿子上初中，母亲也习惯了城里的生活。我对弟弟说，你在你们家附近买一套小房

子，给父母养老。弟弟颇感为难。我那时刚调到上海，没有余力一起承担，指派弟弟买房，不过是空口白话。

在城里带孙子十几年，母亲终于还是回了老家。院子淹没在一人高的荒草中。她和父亲怀着怎样的心情收拾院落，我能想见。两个儿子像两只鸟飞离了老巢，他们在村人那里获得了一点浮薄的虚荣，也失去了儿孙绕膝的快乐，荒凉与寂寞伴随着他们的老境。

母亲是闲不住的人。回到乡下，她租了村子人家的一块地种玉米。我从上海回老家度假，没心没肺摘了一大串玉米，在夏日黄昏跟她在地里、水塘边拍照。这些照片都还在，她笑得多么憔悴，五官从满脸皱纹里突显出来，我那时全没有发现母亲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。

田埂上尽是荒草。母亲反复跟我说，到处都是荒草。她是带着兴奋的口吻说这些的。多年以前，还有耕牛的时候，田埂上光溜溜的，草都被牛吃掉了。那时用柴火灶，稻草、棉花秸不够烧，秋天还要到田埂上、荒地割草，砍野地里的楮树、茵陈，晒干作柴火。母亲一直为缺柴而烦恼。我在外上学，没有为家里砍过一根柴。

父亲的退休金不多，我们各自为自己小家打拼，能给父母的支持很少。母亲说，不用你们帮忙，我还能割草。

村子里早没人割草，许多人家开始用液化气了。田埂、荒地上的草只有母亲一个人去割。父亲说，你也不要太辛苦了，我们两个佬，不生病，生活是没有问题的。

母亲不听。日日走在她年轻时一直走的那些路，离开了十多年的田埂很快又熟悉起来。她的老伙伴有的到外乡带孩子，有的待在家里看电视，有的已经离世，很少出现在田埂上。这十多年的变化太大，她两头不着地，城里没有她的家，村子里也陌生起来。

母亲割了许多草。我猜，她一

个人在荒野里割草，舒筋活骨，比在城里自在，心里会舒服一些。这些草晒干了，捆好了，她舍不得烧，和父亲一起将这些草捆搬到阁楼上。阁楼陈年灰尘中充满了茵陈、艾蒿的香味。

直到母亲去世，到房子翻新，这些草捆被清理出来，那时家里柴火灶也拆除了，用电磁炉、液化气，村子里家家如此，早已没有炊烟，那些草捆在院子里慢慢散开，散成一堆难以处理的垃圾。

母亲出嫁时盼着父亲能把她变成城里人，嫁过来受委屈时抱着儿子，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，保护她；儿子无知无识，虽然流着泪点头，似乎答应了她，但长大后早就忘记这场景了。母亲不断提及往事，儿子毫无知觉，或装聋作哑。

在上海站住了脚，我另买了一套小房子，勉强隔出一间卧室一个小厅，请母亲和父亲到上海来陪我。我住在附近小区，工作日的晚上，周末的中餐和晚餐，父亲母亲买菜做饭，一家五口人围坐在几乎转不过身的小客厅里，终于过上了最普通的幸福生活。每天晚饭后，我们留下来陪父母玩一会牌，我还要争强好胜，不打赢不开心。母亲盼着多玩一会，但毕竟每天有每天的事，母亲很少能尽兴。

我以为这样的愉快时光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
来上海的第二个春天，母亲腹痛，拍片诊疗，我找到熟悉的医生送上片子，医生看了很久，缓缓告诉我是不治之症。我不敢让母亲知道，跑到医院的公厕里，关上门，躲在那个临时密闭的空间，长号不自禁。

我知道终于要永远失去母亲了，过去无力保护她，现在仍然无力保护她。小时候流着泪拼命点头，都是虚妄的承诺。

这些年，母亲不时出现在梦里，很奇怪，梦里，母亲全是病后的样子。上个月回老家给母亲做十周年祭，母亲的四个儿女有了短暂的团聚，姐姐已做了祖母。大家按照乡下的习俗，燃放鞭炮，点燃纸烛，去镇上饭店里订餐，招待前来的亲戚，饮酒，热闹。母亲离去的哀伤在岁月里慢慢淡退。

席间，姐夫说起他家族的一件往事。

姐夫的父亲前几年以八十二岁高龄去世。老人五岁时，当兵的叔叔在战乱中亡故。婶婶对这个五岁的孩子说，高伢，你长大了养婶婶吗？你要是能养婶婶，我就留在你们曹家；你要是不养，我今天晚上就走。

五岁的孩子回答他的婶婶：我不晓得呀，我才五岁。

姐夫模拟着孩子的口吻，将八十年前那句“我不晓得”重复了多遍。我想象老人五岁时说这话的情景，确实符合老人一辈子朴实坦荡的性格。听了这懵懂的回答，婶婶当夜就走了。

失望在希望的最开始就降临，痛苦虽然剧烈，但一痛而绝，未必是坏事。这个婶婶后来嫁了一个小军官，随军南下，到一个小城定居，生活得安稳幸福。

